

辛亥百年名家雜文拾萃

柳蓮編輯

· 導 讀 ·

我想，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，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。(劉半農：“作揖之義”)

在我們心裡，第一個尖兒是自私，其餘就是威權，勢力，親疏，情面等等，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，才輪到我們可憐的正義。(朱自清：正義)

在這並存和折中主義跋扈的中國，是難有徹底的改革，長足的進步的希望。變法幾十年了，成效在哪裡？(夏丏尊：並存和折中)

我想我若能生於明朝末年，就是被李自成來砍幾刀，也比現在所享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，還有價值。(郁達夫：骸骨迷戀者的獨語)

狗道主義的精義：第一是狗的英雄主義，第二是羊的奴才主義，第三是動物的吞噬主義。(瞿秋白：狗道主義)

由不會失敗的英雄，一變而為不會錯誤的聖人，我便與“真理”同體化了，因而“我”與“人”就變成“是”與“非”的同義語了。從此一切暴行祇要是出於我的，便是美德，因為“我”就是“是”。(聞一多：一個白日夢)

我近來常常感覺，平均而論，在任何時代，中國的政府裡頭的血虧、胃滯、精神衰弱、骨節酸軟、多愁善病者，總比任何其他人類團體多……(林語堂：論政治病)

上天生人，給我們一張臉，而厚即在其中，給我們一顆心，而黑即在其中。(李宗吾：厚黑學)

我是民國國民，民國國民的思想和生活習慣使我深深地憎恨一切奴才或奴才相，連同敬畏的尊長和師友們。(聶紺弩：我若為王)

士之讀書志學，蓋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揚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寧死耳。(陳寅恪：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)

劉半農：“作揖主義”

劉半農（1891-1934），中國詩人，語言學家，名復，江蘇江陰人，1917年起在北京大學任教，曾參加新文化運動，提倡白話文；初期詩作有反對封建傾向，形式有意模倣民歌；後留學法國，專攻語音學，創聲調推斷尺，提倡實驗語音學；著有《半農雜文》及詩集《揚鞭集》，採編的民歌集有《瓦釜集》，另有專著《中國文法通論》、《四聲實驗錄》等。

沈二先生與我們談天，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。紅，就是《紅樓夢》；老，就是《老子》。這紅老之學的主旨，簡便些說，就是無論甚麼事，都聽其自然。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？沈先生說：“譬如有人罵我，我們不必還罵，他一面在那裡大聲疾呼的罵人，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。我們在旁邊看看，也很好，何必費着氣力去還罵？又如有一隻狗，要咬我們，我們不必打它，祇是避開了就算，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，自然會互咬起來。所以我們做事，祇須抬起了頭，向前直進，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，再管甚麼閒事，這就叫作聽其自然，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。”我想這一番話，很有些同托爾司太的不抵抗主義相像，不過沈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遊戲名詞罷了。

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讚成，不過因為有些偏於消極，不敢實行。現在一想，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。為甚麼？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，骨底裡是最經濟的積極。我們要辦事有成效，假使不實行這主義，就不免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。我們要保存精神，在正當的地方用，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。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；不有消極，就沒有積極。既如此，我也要有些遊戲筆墨，造出一個“作揖主義”的新名詞來。

“作揖主義”是甚麼呢？請聽我說——

譬如早晨起來，來的第一客，是位前清遺老。他拖了辮子，彎腰曲背走進來，見了我，把眼鏡一摘，拱拱手說：“你看！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：亂臣賊子，遍於國中，欲求天下太平，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，說：“老先生

說的話，很對很對。領教了，再會罷。”

第二客，是個孔教會會長。他穿了白洋布做的“深衣”，古顏道貌的走進來，向我說：“孔子之道，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。現在我們中國，正是四維不張，國將滅亡的時候，倘不提倡孔教，昌明孔道，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，說：“老先生說的話，很對很對，領教了，再會罷。”

第三客，是位京官老爺。他衣裳楚楚，一擺一踱的走進來，向我說：“人的根，就是丹田。要講衛生，就要講丹田的衛生。要講丹田的衛生，就要講靜坐。你要曉得，這種內功，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！”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，說：“老先生說的話，很對很對。領教了，再會罷。”

第四五客，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，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，手攜着手同來的。沒有見面，便聽見一陣“梅郎”“老譚”的聲音。見了面，北京的評劇家說：“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，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；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。”上海的評劇家說：“這話說得不錯呀！我們中國人，何必要看外國戲，中國戲自有好處，何必去學甚麼外國戲？你看這篇文章，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，外國戲裡，也有這樣的好處麼？”他說到“方家”二字，翹了一個大拇指，指着北京的評劇家，隨手拿出一張《公言報》遞給我。我一看那篇文章，題目是“佳戲劇也”四個字，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，說：“兩位老先生說的話，很對很對。領教了，再會罷。”

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。他未進門，便覺陰風慘慘，陰氣逼人，見了面，他說：“鬼之存在，至今已無絲毫疑義。為甚麼呢？因為人所居者為‘顯界’，鬼所居者，尚別有一界，名‘幽界’。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，是鬼之存在，已無疑義。從實質上去證明他，是搜集種種事實，助以精密之器械，繼以正確之試驗，可知除顯界外，尚有一幽界。”就急忙向他作了個揖，說：“老先生說的話，很對很對。領教了，再會罷。”

末了一位客，是王敬軒先生。他的說話最多，洋洋灑灑，一連談了一點多鐘，把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

用”八個字，發揮得詳盡無遺，異常透切。我屏息靜氣聽完了，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，說：“老先生的話，很對很對。領教了，再會罷。”

如此東也一個揖，西也一個揖，把這一班老伯，大叔，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，我仍舊做我的我：要辦事，還是辦我的事；要有主張，還仍舊是我的主張。這不過忙了兩隻手，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，不省事得許多麼？

何以我要如此呢？

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面，官要尊王，革命黨要排滿，官說革命黨是“匪”，革命黨說官是“奴”。這樣牛頭不對馬嘴，若是雙方辯論起來，便到地老天荒，恐怕大家還都是個“纏夾二先生”，斷斷不能有甚麼誰是誰非的分曉，所以為官計，不如少說閒話，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命黨。為革命黨計，也不如少說閒話，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。這不是一刀兩斷，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？

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，在實行一方面，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，自己想想，頗覺慚愧。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，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。既是如此，我們感激之餘，何妨自貶聲價，處於“匪”的地位，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——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——請他處於“官”的地位？自此以後，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匪。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，說甚麼“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，其狂妄乃出人意表。所垂訓於後學者，曰不虛心，曰亂說，曰輕薄，曰破壞。凡此惡德，有一於此，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，而況兼備之耶？”我們看了，非但不還罵，不與他辯，而且還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“鄉下人看告示”，奉送他“一篇大道理”五個字。為甚麼？因為他們本來是官，這些話說，本來是“出示曉諭”以下“右仰通知”以上應有的文章。

到將來，不幸而竟有一天，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：“謝天謝地，現在是好了，洪水猛獸，已一律肅清，再沒有甚麼後生小子，要用夷變夏，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，”那時候，我們自然無話可說，祇得像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，一壁歎氣，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

肚子裡去，或者竟帶這種痛苦，埋入黃土，做螻蛄們的食料。

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“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”了，那麼，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。我說：那時的官老爺，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，卻要說：“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，從前陳獨秀、胡適之、陶孟和、周啟明、唐元期、錢玄同、劉半農諸先生辦《新青年》時，自以為得風氣之先，其時我的新思想，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。”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又怎麼樣呢？我想，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，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。所以我到那時，還是實行“作揖主義”，他們來一個，我就作一個揖，說：“歡迎！歡迎！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！”

半農友明這個“作揖主義”，玄同絕對的讚成，以後見了他們諸公，也要實行這個主義，因為照此辦法，在我們一方面，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於無益的爭辯，專門來提倡除舊布新的主義；在他們諸公一方面，少聽幾句逆耳之言，庶幾寧神靜慮，克享遐齡，可以受褒揚條例第9款的優待，這實在是兩利的辦法。至於到了“萬一的萬一”那一天，他們諸公自稱為新文明的先覺，是一定的；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，是對於老前輩應盡的敬禮，那更是應該的。——玄同附記

朱自清：正義

朱自清(1898-1948)，中國散文家、詩人，字佩弦，江蘇揚州人，原籍浙江紹興。文學研究會成員。學生時代即創作新詩，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，1922年發表長詩〈毀滅〉，後又從事散文寫作；1931年至1932年留學英國，回國後先後在江、浙的幾所著名中學和清華大學、昆明西南聯大等校任教，並致力學術研究；抗戰結束後積極支持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學生運動，1948年8月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糧，因貧病在北平逝世。早期詩作表現對黑暗現實的憂憤和對光明、對美的憧憬；散文風格素樸縝密，清秀沉鬱，以語言洗煉，文筆秀麗著稱。

人間的正義是在哪裡呢？

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裡！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，我們不是得着大批的正義麼？但白白的擱在心裡，誰也不去取用，卻至少是可惜的事。兩石白米堆在屋裡，總要吃它乾淨，兩箱衣服堆在屋裡，總要輪流穿換，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，滿不理會，我們真大方，真捨得！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，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，衣服的一個扣兒。——爽性用它不着，倒也罷了，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，張張皇皇的尋覓着。這個葫蘆裡賣的甚麼藥？我的聰明的同伴呀，我真想不通了！

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，祇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——在“自我”的唇邊，在“威權”的面前，在“他人”的背後。

正義可以做幌子，一個漂亮的幌子，所以誰都願意念着它的名字。“我是正經人，我要做正經事”，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的自詡着。但是除了用以“自詡”之外，正義對於他還有甚麼作用呢？他獨自一個時，在生人中間時，早忘了它的名字，而去創造“自己的正義”了！他所給予正義的，祇是讓它的影兒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。但是，這畢竟不算十分辜負正義，比那憑着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，還勝一籌。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。他嘴裡唱着正義的名字，手裡卻滿滿的握着罪惡；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，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簽條送了去。社會憑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簽條，欣然受了這份禮；就是明知道是罪惡，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！易卜生“社會棟樑”一齣戲，就是這種情形。這種人的唇邊，雖更頻繁的閃爍着正義的彎曲的影兒，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，祇怕早已霉了，爛了，且將毀滅了。在這些人裡，我見不着正義！

在親子之間，師傅學徒之間，軍官兵士之間，上司屬僚之間，仰乎有正義可見了，但是也不然。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，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，他們誠然是不能“違抗的”——甚至“父教子死，子不得不死”一類話也說出來了。他們發見有形的撲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，怎敢去違抗呢？長上們憑着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，他們怎

敢不遵呢？但是你私下問他們，“信麼？服麼？”

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，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！這正是因為長上們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。這種正義祇能由長上行於卑幼，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，所以是偏頗的；這種正義祇能施於卑幼，而不能施於他人，所以是破碎的；這種正義受着威權的鼓弄，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，那時它又是肥大的。這些仍舊祇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。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，我在這等人裡，仍舊見不着它！

在沒有威權的地方，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。名位與金錢的面前，正義祇剩淡如水的微痕了。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！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，但是一當了面，估量着對手的名位，就不免心裡一軟，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——於是不知不覺的就敷衍起來了。至於平常的人，偶然見了所謂名流，也不免要吃一驚，那時就是心裡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為然，也祇好姑且放下，另做出一番“足恭”的樣子，以表傾慕之誠。所以一班達官通人，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，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，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！——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。呀！這樣，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？卻又不然。須知我祇說“面前”是無正義的，“背後”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着。社會的維持，大部分或者就靠着這背後的正義罷。但是背後的正義，力量究竟是有限的，因為隔開一層，不由的就單弱了。一個為富不仁的人，背後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，面前卻祇有恭敬。一個華服翩翩的人，犯了違警律，就是警察也要讓他五分。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！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，而在極親近的人間，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！因為太親近了，甚麼也可以原諒了，甚麼也可以馬虎了，正義就任怎麼彎曲也可以了。背後的正義祇有存在生疏的人們間。生疏的人們間，沒有甚麼密切的關係，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。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，那全是為了情面的緣故。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，一種廉價的同情。現在的人們祇喜歡廉價的東西，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，就盡先取了情面，而將正義放在背後。

在極親近的人間，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，正義就幾乎等於零，就是在背後也沒有了。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，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的不同，啟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摻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——於是仍舊祇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兒。在這些人裡，我更見不着正義！

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哪裡呢？滿藏在我們心裡！為甚麼不取出來呢？它沒有優先權！在我們心裡，第一個尖兒是自私，其餘就是威權，勢力，親疏，情面等等，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，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。你想，時候已經晚了，它還有出臺的機會麼？沒有！所以你要正義出臺，你就得排除一切，讓它做第一個尖兒。你得憑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臺。你還得抖擻精神，準備一副好身手，因為它是初出臺的角兒，搗亂的人必多，你得準備着打——不打不成相識呀！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，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面目了。

夏丏尊：並存和折中

夏丏尊(1886-1946)，中國作家、出版家，原名鑄，字勉旃，號悶庵，浙江上虞人。早年留學日本弘文學院，1907年回國，先後執教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、湖南第一師範、春暉中學、暨南大學等校；曾任開明書店總編輯、編輯所長；1930年被選為中國文藝家協會主席，1937年創辦《月報雜誌》任社長；曾和葉聖陶合著《文心》，並譯有意大利亞米契斯的《愛的教育》。

從小讀過《中庸》的中國人，有一種傳統的思想和習慣，凡遇正反對的東西，都把他並存起來，或折中起來，意味的有無是不管的。這種怪異的情形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都可隨在發見。

已經有警察了，敲更的更夫依舊在城市存在，地保也仍在各鄉鎮存在。已經裝了電燈了，廳堂中同時還掛着錫製的“滿堂紅”。劇場已用布景，排着布景的桌椅了，演劇的還坐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。已經用白話文了，有的學校同時

還教着古文。已經改了陽曆了，陰曆還在那裡被人沿用。已經國體共和了，皇帝還依然坐在北京，……這就是所謂並存。

如果能“並行而不悖”原也不妨。但上面這樣的並存，其實都是悖的。中國人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來掩飾其悖，使人看了好像是不悖的。這方法是甚麼？就是“巧立名目”。

有了警察以後，地保就改名“鄉警”了；行了陽曆以後，陰曆就名叫“夏正”了；改編新軍以後，舊式的防營叫做“警備隊”了；明明是一妻一妾，也可以用甚麼叫做“兩頭大”的名目來並存；這種事例舉不勝舉，實在滑稽萬分。現在的督軍制度，不就是以前的駐防嗎？總統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嗎？都不是在那裡借了巧立的名目，來與“民國”並存的嗎？以彼例此，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了！

至於折中的現象，也到處都是。醫生用一味冷藥，必須再用一味熱藥來防止太冷；髮辮剪去了，有許多人還把辮子底根盤留着，以為全體剪去也不好；除少數的都會的婦女外，鄉間做母親的有許多還用“太小不好，太大也不好”的態度，替女兒纏成不大不小的中腳。“某人的話是對的，不過太新了”，“不新不舊”也和“不豐不儉”“不亢不卑”……一樣，是一般人們底理想！“於自由之中，仍寓限制之意”，“法無可恕，情有可原”，……這是中國式的公文格調！“不可太信，不可太不信”，這是中國人底信仰態度！

這折中的辦法是中國人的長技，凡是外來的東西，一到中國人底手裡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處分。折中了外來的佛教思想和中國固有的思想，出了許多的“禪儒”；幾次被他族征服了，卻幾次都能用折中的方法，把他族和自己的種族弄成一樣。這都是歷史上中國人的奇跡！

“中西”兩個字觸目皆是：有“中西藥房”，有“中西旅館”，有“中西大菜”，有“中西醫士”，還有中西合璧的家屋，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畫！

討價一千，還價五百，不成的時候，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數來折中。不但買賣上如此，到處都可

用為公式。甚麼“妥協”，甚麼“調停”，都是這折中的別名。中國真不愧為“中”國哩！

在這並存和折中主義跋扈的中國，是難有徹底的改革，長足的進步的希望。變法幾十年了，成效在哪裡？革命以前與革命以後，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髮辮，把一面黃龍旗換了五色旗以外，有甚麼大分別？遷就復遷就，調停復調停，新的不成，舊的不成，即使再經過多少年月，恐怕也不能顯著地改易這老大國家的面目吧！

我們不能不詛咒古來“不為己甚”的教訓！我們要勸國民吃一服“極端”的毒藥，來振起這祖先傳下來的宿疾！我們要拜託國內軍閥：“你們如果要作孽的，務須快作，務須作得再厲害一點！你們如果是卑怯的，務須再卑怯一點！”我們要懇求國內的政客：“你們底‘政治’應該極端才好！要制憲嗎？索性制憲！要聯省自治嗎？索性聯省自治！要復辟嗎？復辟也可以！要賣國嗎？爽爽快快地賣國就是了！”我們希望我國軍閥中，有拿破崙那樣的人；我們希望我國‘政治家’中，有梅特涅那樣的人。辛亥式的革命，袁世凱式的帝制，張勳式的復辟，南北式的戰爭，忽而國民大會，忽而人民制憲，忽而聯省自治等類不死不活不痛不癢的方子，愈使中華民國的毛病陷入慢性，我們對於最近的奉直戰爭，原希望有一面倒滅的，不料結果仍是一個並存的局面，仍是一個折中的覆轍！

社會一般人的心裡都認執拗不化的人為癡獃，以模稜兩可、不為己甚的人為聰明。中國人實在比一切別國的人來得聰明！同是聖人，中國的孔子比印度棄國出家的釋迦聰明得多，比猶太的為門徒所賣身受酷刑的耶穌也聰明得多哩！至於現在，國民比聰明的孔子更聰明了！

我希望中國有癡獃的人出現！沒有釋迦、耶穌等類的太癡獃也可以，至少像托爾斯泰、易卜生等類的小癡獃是要幾個的！現在把癡獃的易卜生底呆話，來介紹給聰明的同胞們吧：

“不完全，則寧無！”

郁達夫：骸骨迷戀者的獨語

郁達夫(1896-1945)，中國小說家、散文家、詩人，浙江富陽人，青年時代留學日本；1921年出版小說《沉淪》，與郭沫若等發起組織“創造社”，回國後從事新文學創作，主編《創造季刊》、《洪水》等文學刊物，並先後在北京大學、武昌大學、中山大學等校任教；1928年與魯迅合編《奔流》雜誌，致力於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；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，抗日戰爭時期在新加坡主編《星洲日報》文藝副刊，積極從事抗日宣傳工作，新加坡陷落後流亡到蘇門答臘，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憲兵隊殺害；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烈士。

文明大約是好事情，進化大約是好現象，不過時代錯誤者的我，老想回到古時候還沒有皇帝政府的時代——結繩代字的時代——去做人。生在亂世，本來是不大快樂的，但是我每自傷悼，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亂世，何以不生在晉的時候。我雖沒有資格加入竹林七賢——他們是賢是愚，暫且不管，世人在這樣的稱呼他們，我也沒有別的新名詞來替代——之列，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時候，至少也可聽聽阮籍的哭聲。或者再遲一點，於風和日朗的春天，長街上跟在陶潛的後頭，看看他那副討飯的樣子，也是非常有趣。即使不要講得那麼遠，我想我若能生於明朝末年，就是被李自成來砍幾刀，也比現在所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，還有價值。因為那時候還有幾個東林復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俠妓名娼，聽聽他們中間的奇行異跡，已盡夠使我們現實的悲苦忘掉，何況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說書呢？不曉是甚麼人的詩，好像有一句“並世頗嫌才士少”，——下句大約是“著書常恨古人多”吧？——我也常作這樣的想頭，不過這位詩人好像在說“除我而外，同時者沒有一個才士”，而我的意思是“同時者若有許多人材，那麼聽聽這些才士的逸事，也可以快快樂樂過一生。”這是詩人與我見解不同的地方。

講到了詩，我又想起我的舊式的想頭來了。目下在流行者的新詩，果然很好，但是像我這樣懶惰無聊，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，性情最適宜的，

還是舊詩，你弄到了五個字，或者七個字，就可以把牢騷發盡，多麼簡便啊。我記得前年生病的時候，有一詩給我女人說：

“生死中年兩不堪，生非容易死非甘，劇憐病骨如秋鶴，猶吐青絲學晚蠶，一樣傷心悲薄命，幾人憤世作清談，何當放棹江湖去，淺水蘆花共結庵。”

若用新詩來寫，怕非要寫幾十行字不能說出呢！不過像那些老文巧的甚麼詩選，甚麼派別，我是不大喜歡的，因為他們的成見太深，弄不出真正的藝術作品來。

近來國學昌明，舊書鋪的黃紙大字本的木版書，同中頭彩的影票一樣，驟漲了市價，卻是一件可賀的喜事，不過我想這一種骸骨的迷戀，和我的骸骨迷戀，是居於相反的地位。我祇怕現代的國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“易厭”的“好奇”的心理看重了。但願他們不要把當初建設下來的注音字母打破，能根本的作他的整理國故的事業才好。

喜新厭舊，原是人之常情，不過我們黃色同胞的喜新厭舊，未免是過激了。今日之新，一變即成為明日之舊，前日之舊，一變而又為後日之新，扇子的忽而行怯忽而行短，鞋頭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圓，便是一種國民性的表現，我祇希望新文學和國故，不要成為長柄短柄的扇子，尖頭圓頭的靴鞋。

前天在小館子裡吃飯，看見壁上有一張“莫談國事”的揭示，我就叫夥計過來，問他我們應該談甚麼，他聽不懂我的話，就報了許多炒羊肉，炸鯉魚等等的菜名出來。往後我用手點了那張紅條問他從甚麼時候起的，他笑了一笑說：

“嘿，這是古得很咧！”

我覺得這一個骸骨迷戀，卻很有意思。

近來頭腦昏亂，讀書也不能讀，做稿子也做不出，祇想回到小時候吃飯不管事的時代去。有時候一個人於將晚的時候在街上獨步，看看同時代的人的忙碌，又每想振作一番，做點事業出來，當這一種思想起來的時候，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，不留許多遺產給我，便自家罵自家說：

“你這骸骨迷戀！你該死！你該死！”

瞿秋白：狗道主義

瞿秋白（1899-1935）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、理論家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。江蘇常州人，1917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，1920年以《晨報》記者身份訪問蘇俄，寫了大量通訊，向國內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真實情況；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23年回國，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負責《新青年》、《前鋒》、《嚮導》等刊物的編輯工作，同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參加起草黨綱，並參與創辦上海大學，任社會學系主任；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，同國民黨右派的“戴季陶主義”和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作鬥爭；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，於8月7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，會後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犯了“左”傾盲動錯誤，但為恢復黨的戰鬥力，開創革命新時期，建立了巨大功勳。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，當選為執行委員和主席團委員，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；1930年回國，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，糾正了黨內“左”傾冒險主義的錯誤，1934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擊，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；後在上海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，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；1934年到中央蘇區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教育人民委員，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，留在蘇區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中央辦事處教育部長。是中共第四屆中央委員、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、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。他於1935年2月突圍轉移途中在福建長汀遭國民黨包圍被俘，因叛徒出賣暴露身份，5月18日英勇就義。

最近有人說：“祇有人道主義的文學，沒有狗道主義的文學。”

然而，我想：中國祇有狗道主義的文學，而沒有人道主義的文學。中國文人最愛講究國粹，而國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。因此，要問讀者諸君貴國的文學是甚麼，最好請最古的太史公來回答。他說，這是“主上所戲弄，倡優所畜，流俗之所輕也”！

人道主義的文學，據說是“被壓迫者苦難者的朋友”。可是，請問中國現在除了“被壓迫者苦難者”自己之外，還有甚麼“朋友”？“苦難者”的文

學和“苦難者朋友”的文學，現在差不多都在萬重的壓迫之下。這種文學不能夠是人道主義的，因為“被壓迫者”自己沒有資格對自己講仁愛，沒有可能也沒有理由對壓迫者去講甚麼仁愛的人道主義。

於是乎狗道主義的文學就耀武揚威了。

固然，18世紀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文學之中，曾經有過人道主義。然而20世紀的中國資產階級，尤其是1927年之後，根本不能夠有那種人道主義。中國資產階級始終和封建地主聯繫着，最近更和他們混合生長着。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“關於萬能”主義，外國資本的壟斷市場，租田制度和高利貸商業資本的畸形發展，……使榨取民眾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積累的資本，總在流轉到一種特殊的“貨幣銀行資本”裡去，而且從所謂民族工業裡逃出來。中國資產階級之中的領導階層，現在難道不是那些中國式的大大小的銀行銀號錢莊嗎？這些“貨幣銀行資本”的最主要的投資，除出做進出口生意的墊款和高利貸的放賬以外，就是公債生意。而在公債等類的生意裡面，利率比那種破產衰落的工業至少要高二三十倍。這種資產階級會有甚麼人道主義？他們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，不是誑騙民眾去爭甚麼自由平等。不是的。遠東第一大偉人，比盧梭等類要直爽而公開得多。這大約是因為中國有一座萬里長城做他的臉皮。他就爽爽快快地說：不准要甚麼自由平等，國民應該犧牲自由維持不平等，而去爭“國家的自由和平等”。所以這頂民族的大帽子，是用來誑騙民眾安心做奴隸的。歐洲18世紀的資產階級要誑騙民眾去爭自由平等，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眾反對貴族地主，要叫民眾“自由平等的”來做自己的奴隸，而不再做貴族僧侶的奴隸。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又要誑騙民眾“為着民族和國家”安心些，更加鎮靜些做紳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隸。

所以很自然的祇會有狗道主義的文學。這是獵狗，這是走狗的文學，因為這些地主資產階級的走狗的主人，本身又是帝國主義的走狗。這種走狗的走狗，自然是狗氣十足，狗有狗道，此之謂狗道主義。

狗道主義的精義：第一是狗的英雄主義，第二是羊的奴才主義，第三是動物的吞噬主義。

英雄主義的用處是很明顯的：一切都有英雄，例如諸葛亮等類的人物，來包辦，省得阿斗群眾操心！英雄的鼓吹總算是“獨一無二的”誑騙手段了。這是獨一無二的，因為另外還有些誑騙的西洋鏡，早已拆穿了；祇有那狗似的英勇，見着叫化子拚命地咬，見着財神老爺忠順地搖尾巴——彷彿還可以叫主人稱贊一句：“好狗子！”至於羊的奴才主義，那就是說：對着主人，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馴服得像小綿羊一樣。

話說元朝時候，漢族的紳商做了蒙古王公的走狗和奴才，其中有一位將軍叫做宋大西，他對於元朝皇帝十分忠順。他跟着蒙古軍隊去打俄羅斯，居然是個“勇士”。元朝的帝國主義打平了中國，又去打俄國，——他是到處都很出力的，到處都要開鑼喝道地喊着：“萬歲喲，馬上的能韃靼！永久喲，神武的大元！”有一天，他忽然間詩興勃發，唸出一首詩來：

外表賽過勇士，心裡已如失望的小羊。
無家可歸的小羊喲，何處是你的故鄉？

這首詩的確高明，尤其是那“賽過”兩個字用得“奇妙不堪言喻”。真是天才的詩人呀！“賽過”！一隻馴服的亡國奴的小羊，居然賽過勇士和英雄！

這些狗呀羊呀的動物，有甚麼用處？嘿，你不要看輕了這些動物！天神還借用它們來懲罰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類呢。

原來某年月日，外國的天父上帝和中國的財神菩薩開了一個方桌會議，決定叫這些動物，張開吃人的血口，大大地吞噬一番，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，那些敢於反抗的人，那些不願意被“主上所戲弄，倡優所畜”的人。有詩為證：

天父和菩薩在神國開會相逢，
選定了沙漠的動物拿來借用；
於是米加勒高舉火劍，愛普魯拉着銀弓；
一剎那便刀光血影，青天白日滿地紅！

聞一多：一個白日夢

聞一多(1899-1946)，中國詩人、學者，湖北浠水人，曾留學美國，學美術、文學，早年參加新月社，先後在青島大學、清華大學等校任教，著有詩集《紅燭》《死水》，表現了對祖國深摯的感情和對黑暗現實的憎惡和抗議；在形式上主張格律化，追求“音樂美、繪畫美、建築美”，詩風穠麗深沉，結構整飭謹嚴；後來主要從事學術研究，在《周易》《詩經》《莊子》《楚辭》的研究中得到相當的成就；抗日戰爭期間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，1943年後積極參加反對獨裁、爭取民主的鬥爭，抗日戰爭結束後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，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。

林蔭路旁侍立着一排像是沒有盡頭的漂亮的黃牆，牆上自然不缺少我們這“文字國”最典型的方塊字的裝飾，祇因馬車跑得太快，來不及念它，心想反正不是機關，便是學校，要不就是營房。忽然兩座約莫二丈來高，影壁不像影壁，華表不像華表，極盡醜惡之能事的木質構造物闖入了視野，像黑夜裡冷不防跳出一聲充滿殺氣的“口令”！那東西可把人嚇一跳！那威風凜凜的稻草人式的構造物，和它上面更威風的藍地白書的八個擘窠大字：“頂天立地、繼往開來”，也不知道是出自誰人的手筆，或哪部“經典”，對子倒對得頂穩的。可是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那些，我祇覺得一陣頭昏眼花；不是嚇唬的（稻草人可嚇得倒人？）我的頭昏眼花恰恰是像被某種氣味熏得作嘔時的那一種。我問我自己，這究竟是一種甚麼氣味？怎麼那樣衝人？

我想起十字牌的政治商標，我明白了。不錯，八個字的目的如果在推銷一個個人的成功秘訣，那除了希特勒型的神經病患者，誰當得起？如果是標榜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，除了納粹德國一類的世界裡，又哪兒去找這樣的夢？想不出我們炎黃子孫也變得這樣偉大！果然如此，區區個人當然也“與有榮焉”，——我的耳根發熱了。

個人主義和由它放大的本位主義的肥皂水，雖然吹起這種大而美麗的泡，看，它不但囊括了全部

的空間“頂天立地”，還壟斷了整個的時間“繼往開來”！怕祇怕一得意，吹得太使勁兒，泡炸了，到那時原形畢露，也不過那麼小小一滴水而已。我真為它——也為我自己——捏一把汗。

個人之於社會等於身體的細胞，要一個人身體健全，不用說必需每個細胞都健全。但如果某個細胞太喜歡發達，以至超過它本分的限度而形成癭瘤之類，那便是病了。健全的個人是必需的，個人發達到排他性的個人主義卻萬萬要不得，如今個人主義還不祇是癭瘤，它簡直是因毒菌敗壞了一部分細胞而引起的一種惡性發炎的癰疽，浮腫的肌肉開着碗口大的花，那何嘗不也是花花綠綠的絢爛的色彩，其實祇是一塊臭膿爛肉。唉！氣味便是從那裡發出的吧！

從排他性的個人主義到排他性的民族主義，是必然的發展。我是英雄，當然我的族類全是英雄。炎性是會得蔓延的，這不必細說。

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必然也是個唯心主義者。心靈是個人行為的發號施令者，誇大了個人，便誇大了心靈。也許我祇是歷史上又一個環境的幸運兒，但我總以為我的成功，完全由於自己的意志或精神力量，祇因為除了我個人，我甚麼也沒看見。我祇知道向自己身上去發現成功的因素，追得愈深，想得愈玄，於是便不能不墮入唯心論的迷魂陣中。

一切環境因素，一切有利的物質條件，一切收入的賬簿被轉到支出項下了，我驚訝於自身無盡的財富，而又找不出它的來源，我的結論祇好是“天生德於予”了。於是我不是英雄，而且是聖人了！

由不會失敗的英雄，一變而為不會錯誤的聖人，我便與“真理”同體化了，因而“我”與“人”就變成“是”與“非”的同義語了。從此一切暴行祇要是出於我的，便是美德，因為“我”就是“是”。到這時，可憐的個人主義便交了惡運，環境漸漸於我不利，我於是猜忌，瘋狂，甚至迷信，我的個人主義終於到了惡性發炎的階段，我的結局……天知道是甚麼！

林語堂：論政治病

林語堂(1895-1976)，中國散文家、小說家，福建龍溪人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，1919年去美國留學，後轉赴德留學，獲哲學博士學位。1923年歸國，任北京大學英文教授，曾參加語絲社；1926年去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，次年到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任外交秘書；1932年起在上海編輯《論語》、《人間世》、《宇宙風》等刊物，提倡“幽默閑適”小品，成為“論語派主要代表”；1936年赴美國從事寫作活動，英譯了《論語》(譯名《孔子的智慧》)、《老子》等，後在香港病逝。

曲齋老人解“父母惟其疾之憂”，說要人常患政治病，病就是下臺，所以做父母的每引為憂。我想政治病，雖不可常有，但不可全無。姑把我的意見，寫下來如左。

我近來常常感覺，平均而論，在任何時代，中國的政府裡頭的血污、胃滯、精神衰弱、骨節酸軟、多愁善病者，總比任何其他人類團體多，病院、療養院除外。自袁世凱之腳氣，至孫中山之肝癌，以及較小的人物所有外內骨皮花柳等科的毛病合起來，幾乎可充塞任何新式醫院，科科住滿，門門齊備了。在要人下野電文中比較常見的，我們可以指出：腦部軟化、血管硬化、胃弱、脾虧、肝膽生石、尿道不通、牙蛀、口臭、眼紅、鼻流、耳鳴、心悸、脈跳、背癱、胸痛、盲腸炎、副辜丸炎、糖尿、便秘、痔漏、肺癆、腎虧、喇叭管炎，……還有更文雅的，如厭世、信佛、思反初服、增進學問、出洋唸書、想媽媽等（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，“養病”二字，若不是那樣風雅，就很少人要生病了）……總之，人間世上可有之病，五臟腑可反之常，應有盡有了。祇有婦科不大，其理由是由中國女子上臺下臺者尚少，不然一定子宮下墜、卵巢左傾等，也都不至無人過問了。同時一人可以兼有數病，而精神衰弱必與焉。

我已說過，政治病雖不可常有，亦不可全無。各人支配一二種，時到自有用處。凡上臺的人，都得先自打算一下，我是要選哪一種呢？病有了，上臺後，就有恃無恐，說話聲音可以放響亮些。比方

你是海軍總長，而想提出一擴充海軍增加預算的議案在閣議上通過，你若沒有膀胱發炎或是失眠症，那個預算便十九沒有通過的希望。假定你膀胱不能發炎，而財政部卻血管硬化(血壓太高)，他便佔優勢，而你立下風了。財政部長，要對你說：“在這國帑空虛民窮財盡之時，你若堅執增加預算，我祇好血壓增加而辭職了。”那時你有甚麼辦法？但假使你有膀胱發炎，你便有法實在身了。你說：“你真不給我錢，我膀胱就得發炎了。”這樣旗鼓相當，財政部長，遂亦無話可說。此時行政院長，若有點機智，他必拉你在旁附耳說：“老兄，你也不必這樣堅持，財長的脾氣是你所曉得的。我上回風濕都壓不住他。他說要血壓高，就一定血壓高起來，在這外攻內思之時，大家應當精誠團結才好。所以兄弟說，你也不必堅執膀胱炎不炎了，改為失眠何如？你到湯山靜養幾天，而我也勸勸財長血壓不要一定高，改為感冒，和衷共濟，大事化為小事，小事化為無事，不就得了嗎？”不一會，你已經驅車直出和平門(?)在湯山的路上，而那海軍預算提案也正在作宰予的晝寢。

我並非說，我們要人的病都是假的。患痔漏的要人，委實痔漏，怔忡症的政客也委實怔忡。我知道閻錫山真正患過長期痢疾，那是阿米巴作祟。同樣的，馮玉祥上泰山時，他真正有咳嗽。我們所要指出的是，凡要人都應該有相當的病菌蘊伏着，可為不時之需，下野時才有貨真價實的病症及醫生的證書可以昭示記者。假定我做官，我不想發糖尿，尿而可糖，未免太笑話，西醫的話本來就靠不住。大概腸胃中任何症都使得。我打算要有一個完全暴棄的脾胃及頹唐萎靡的神經。

我所以採取消化病的理由是：做了官，這種病必會發的。雖然，我此刻有十分健全的脾胃，除了橡皮鞋以外，咽得下去的保管消化得來。但是無論你先天的脾胃怎樣好，也經不起官場酬應中的糟塌。我知道，做了官就不吃早飯，卻有兩頓中飯，三四頓夜飯的飯局。平均起來，大約每星期有十四頓中飯，及二十四頓夜飯的酒席。就此可知官場中肝病、胃病、腎病何以會這樣風行了。所以，政客食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稀奇。我相信凡官僚都

貪食無厭，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，都去消化燕窩、魚翅、肥雞了。除非有人肯步黃伯樵、馮玉祥的後塵，減少飯菜，中國政客永不會有精神對付國事的。我不相信，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公救國救民的。他們過那種生活，肝胃若不起變化，才是奇事？我意思不過勸勸他們懂一點衛生常識，並提醒他們，腎部操勞過甚，不利於清爽的頭腦的。有人說譚延闓滿腹經綸，我卻說他滿腹燕窩魚翅。譚公為甚麼死啊？

總而言之，我們政府中比世界任何政府中較多閉結、腳氣、肺癆、痔漏、神經衰弱、肚腸傳染、膀胱發炎、腎部過勞、脾胃虧損、肝部生癌、血管硬化、腦汁糊塗的人物，人人在鞠躬盡瘁、為國捐軀、帶病辦公，人人皮包裡公文中夾雜一張醫生驗症書，等待相當時機，人人將此病症書招示記者趕夜車來滬，進滬西上海療養院“養病”。療養院的外國醫生哪裡知道那早經傳染的臟腑及富於細菌的尿道，是他們政治上鬥爭的武器及失敗後撒嬌的仙方。

李宗吾：厚黑學

李宗吾(1879-1943)，中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、幽默諷刺文學大師，四川富順自流井人，1907年畢業於四川高等學堂，在校已加入同盟會；一生致力於教育，係四川大學教授，曾任省議員、教育廳副廳長、省督學；1912年以驚世奇書《厚黑學》震驚世界，由此自稱“厚黑教主”，人稱“厚黑大師”，名列“影響中國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傑”，譯本傳遍世界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。

我自讀書識字以來，就想為英雄豪傑，求之四書五經，茫無所得，求之諸子百家，與夫廿四史，仍無所得，以為古之為英雄豪傑者，必有不傳之秘，不過吾人生性愚魯，尋他不出罷了。窮索冥搜，忘寢廢食，如是者有年，一旦偶然想起三國時幾個人物，不覺恍然大悟曰：得之矣，得之矣，古之為英雄豪傑者，不過面厚心黑而已。

三國英雄，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長，全在心黑：他殺呂伯奢，殺孔融，殺楊修，殺董承伏完，又殺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顧，並且明目張膽地說：“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。”心子之黑，真是遠於極點了。有了這樣本事，當然稱為一世之雄了。

其次要算劉備，他的特長，全在於臉皮厚：他依曹操，依呂布，依劉壽，依孫權，依袁紹，東奔西走，寄人籬下，恬不為恥，而且生平善哭，做三國演義的人，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，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，對人痛哭一場，立即轉敗為功，所以俗語有云：“劉備的江山，是哭出來的。”這也是一個有本事的英雄。他和曹操，可稱雙絕；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，一個心子最黑，一個臉皮最厚，一堂晤對，你無奈我何，我無奈你何，環顧袁本初諸人，卑鄙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說：“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”

此外還有一個孫權，他和劉備同盟，並且是郎舅之親，忽然奪取荊州，把關羽殺了，心之黑，彷彿曹操，無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請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。他與曹操比肩稱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丞駕下稱臣，臉皮之厚，彷彿劉備，無奈厚不到底，跟着與魏絕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。他雖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備，卻是二者兼備，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。他們三個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開來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時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為三。

後來曹操、劉備、孫權，相繼死了，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，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薰陶，集厚黑學之大成，他能欺人寡婦孤兒，心之黑與曹操一樣，能夠受巾幗之辱，臉皮之厚，還更甚於劉備；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事，不禁拍案大叫：“天下歸司馬氏矣！”所以得到了這個時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統一，這都是“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”。

諸葛武侯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馬氏還是沒有辦法，他下了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”的決心，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土地，竟至嘔血而死，可見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高手。

我把他幾個人物的事，反復研究，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秘訣，發現出來。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貫之：“厚黑而已。”茲再舉漢的事來證明一下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咽鳴叱咤，千人皆廢，為甚麼身死東城，為天下笑！他失敗的原因，韓信所說：“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”兩句話，包括盡了。婦人之仁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匹夫之勇，是受不得氣，其病根在臉皮不厚。鴻門之宴，項羽和劉邦，同坐一席，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，祇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割，“太高皇帝”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掛出，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劉邦逃走。垓下之敗，如果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尚不知鹿死誰手？他偏偏說：“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，憐我念我，我何面目見之。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？”這些話，真是大錯特錯！他一則曰：“無面見人”；再則曰：“有愧於心。”究竟高人的面，是如何長起得，高人的心，是如何生起得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說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戰之罪”，恐怕上天不能任咎罪。

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，史記載：項羽向漢王曰：“天下匈匈數歲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。”漢王笑謝曰：“吾寧鬥智不鬥力。”請問笑謝二字從何生出？劉邦見酈生時，使兩女子洗腳，酈生責他倨見長者，他立即綴洗起謝。請問起謝二字，又從何生出？還有自己的父親，身在俎下，他要分一杯羹，親生兒女，孝惠魯元，楚兵追至，他能夠推他下車；後來又殺韓信，殺彭越，“鳥盡弓藏，兔死狗烹”。請問劉邦的心子，是何狀態，豈是那“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”的項羽，所能夢見？太史公著本紀，祇說劉邦隆準龍顏，項羽是重瞳子，獨於二人的面皮厚薄，心之黑白，沒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劉邦的面，劉邦的心，比較別人特別不同，可稱天縱之聖。黑之一字，真是“生和安行，從心所欲不踰矩”，至於厚字方面，還加了點學力，他的業師，就是三傑中的張良，張良的業師，是圯上老人，他們的衣鉢真傳，是彰彰可考的。圯上受書一事，老人種種作用，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。這個

道理，蘇東坡的留侯論，說得很明白。張良是有夙根的人，一經指點，言下頓悟，故老人以王者師期之。這種無上妙法，斷非鈍根的人所能瞭解，所以史記上說：“良為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曰，沛公殆天授也。”可見這種學問，全是關乎資質，明師固然難得，好徒弟也不容易尋找。韓信求封齊王時候，劉邦幾乎誤會，全靠他的業師在旁指點，彷彿現在學校中，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。以劉邦的天資，有時還有錯誤，這種學問的精深，就此可以想見了。

劉邦天資既高，學歷又深，把流俗所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五倫，一一打破，又把禮義廉恥，掃除淨盡，所以能夠平蕩群雄，統一海內，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餘氣，方才消滅，漢家的系統，於是乎才斷絕了。

楚漢的時候，有一個人，臉皮最厚，心不黑，終歸失敗，此人為誰？就是人人知道的韓信。跨下之辱，他能夠忍受，厚的程度，不在劉邦之下。無奈對於黑字，欠了研究，他為齊王時，果能聽蒯通的話當然貴不可言，他偏偏繫念着劉邦解衣推食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說：“衣人之衣者，懷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”後來長樂鐘室，身首異處，夷及之族，真是咎由自取。他譏誚項羽是婦人之仁，可見心子不黑，作事還要失敗的，這個大原則，他本來也是知道的，但他自己也在這裡失敗，這也怪韓信不得。

同時又有一個人，心最黑，臉皮不厚，也歸失敗，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姓范名增。劉邦破咸陽，繫子嬰，還軍霸上，秋毫不犯，范增千方百計，總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劉邦彷彿，無奈臉皮不厚，受不得氣，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王，增大怒求去，歸來至彭城，疽後背死。大凡做大事的人，哪有動輒生氣的道理？“增不去，項羽不亡”，他若能隱忍一下，劉邦的破綻很多，隨便都可以攻進去。他憤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，把項羽的江山，一齊送掉，因小不忍，壞了大事。蘇東坡還稱他是人傑，未免過譽？

據上面的研究，厚黑學這種學問，法子很簡單，用起來卻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劉邦

司馬懿把它學完了，就統一天下，曹操劉備各得一偏，也能稱孤道寡，割據爭雄，韓信、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時，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，並世而生，以致同歸失敗。但是他們在生的時候，憑其一得之長，博取王侯將相，顯赫一時，身死之後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，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蹟，大家都津津樂道，可見厚黑學終不負人。

上天生人，給我們一張臉，而厚即在其中，給我們一顆心，而黑即在其中。從表面上看去，廣不數寸，大不盈掬，好像了無奇異，但，若精密的考察，就知道它的厚是無限的，它的黑是無比的，凡人世的功名富貴、宮室妻妾、衣服車馬，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，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議。鈍根眾生，身有至寶，棄而不用，可謂天下之大愚。

厚黑學共分三步功夫，第一步是“厚如城牆，黑如煤炭”。起初的臉皮，好像一張紙，由分而寸，由尺而丈，就厚如城牆了。最初心的顏色，作乳白狀，由乳色而炭色、而青藍色，再進而就黑如煤炭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祇能算初步功夫；因為城牆雖厚，轟以大炮，還是有攻破的可能，煤炭雖黑，但顏色討厭，眾人都不願接近它，所以祇算是初步的功夫。

第二步是“厚而硬，黑而亮”。深於厚學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點不動，劉備就是這類人，連曹操都拿也沒辦法。深於厚學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買主越多，曹操就是這類人，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中原名流，傾心歸服，真可謂“心子漆黑，招牌透亮”，能夠到第二步，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，但還露了跡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操的本事，我們一眼就看出來了。

第三步是“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”。至厚至黑，天上後世，皆以為不厚不黑，這個境界，很不容易達到，祇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。有人問：“這種學問，哪有這樣精深？”我說：“儒家的中庸，要講到‘無聲無臭’方能終止，學佛的人，要到‘菩提無樹，明鏡非臺’，才算正果，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秘，當然要做到‘無形無色’，才算止境”。

總之，由三代以至於今，王侯將相，豪傑聖賢，不可勝數，苟其事之有成，何一不出於此；書冊俱在，事實難誣，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，自去搜尋，自然左右逢源，頭頭是道。

聶紺弩：我若為王

聶紺弩(1903-1986)，詩人、作家、編輯家、古典文學研究家，因在言論詩詞中被加“現行反革命罪”服刑九年多後於1976年獲釋；其作品《我若為王》選入人教版語文七年級課本。他是中國現代雜文史上繼魯迅、瞿秋白之後，成績卓著、影響很大的戰鬥雜文大家，文風恣肆酣暢、反復駁難、淋漓盡致。

在電影刊物上看見一個影片的名字：“我若為王”。從這影片的名字，我想到和影片毫無關係的另外的事。我想，自己如果作了王，這世界會成為一種怎樣的光景呢？這自然是一種完全可笑的幻想，我根本不想作王，也根本看不起王，王是甚麼東西呢？難道我腦中還有如此封建的殘物麼？而且真想作王的人，他將用他的手去打天下，決不會放在口裡說的。但是假定又假定，我若為王，這世界會成為一種怎樣的光景？

我若為王，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。我的妻的德性，我不懷疑，為王后祇會有餘的。但縱然沒有任何德性，縱然不過是個娼妓，那時候，她也仍舊是王后。一個王后是如何地尊貴呀，會如何地被人們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樣捧來捧去呀，假如我能夠想像，那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我若為王，我的兒子，假如我有兒子，就是太子或王子了。我並不以為我的兒子會是一無所知、一無所能的白癡，但縱然是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白癡，也仍舊是太子或王子。一個太子或王子是如何地尊貴呀，會如何地被人們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樣地捧來捧去呀。假如我能夠想像，倒是件不是沒有趣味的事。

我若為王，我的女兒就是公主。我的親眷都是皇親國戚。無論他們怎樣醜陋，怎樣頑劣，怎樣……

也會被人們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樣地捧來捧去，因為他們是貴人。

我若為王，我的姓名就會改作“萬歲”，我的每一句話都成為“聖旨”。我的意慾，我的貪念，乃至每一個幻想，都可竭盡全體臣民的力量去實現，即使是無法實現的。我將沒有任何過失，因為沒有人敢說它是過失；我將沒有任何罪行，因為沒有人敢說它是罪行。沒有人敢呵斥我，指摘我，除非把我從王位上趕下來。但是趕下來，就是我不為王了。我將看見所有的人們在我面前低頭，鞠躬，匍匐，連同我的尊長，我的師友，和從前曾在我面前昂頭闊步耀武揚威的人們。我將看不見一個人的臉，所看見的祇是他們的頭頂和帽盔。或者所能夠看見的臉都是諂媚的、乞求的，快樂的時候不敢笑，不快樂的時候不敢不笑，悲戚的時候不敢哭，不悲戚的時候不敢不哭的臉。我將聽不見人們的真正的聲音，所能聽見的都是低微的、柔婉的、畏葸和嬌癡的，唱小旦的聲音：“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”這是他們的全部語言：“有道明君！偉大的主上啊！”這就是那語言的全部內容。沒有在我之上的人了，沒有和我同等的人了，我甚至會感到單調、寂寞和孤獨。

為甚麼人們要這樣呢？為甚麼要捧我的妻、捧我的兒女和親眷呢？因為我是王，是他們的主子，我將恍然大悟：我生活在這些奴才們中間，連我所敬畏的尊長和師友也無一不是奴才，而我自己也不過是一個奴才的首領。

我是民國國民，民國國民的思想和生活習慣使我深深地憎惡一切奴才或奴才相，連同敬畏的尊長和師友們。請科學家們不要見笑，我以為世界之所以還大有待於改進者，全因為有這些奴才的緣故。生活在奴才們中間，作奴才們的首領，我將引為生平的最大的恥辱，最大的悲哀。我將變成一個暴君，或者反而正是明君：我將把我的臣民一齊殺死，連同尊長和師友，不准一個奴種留在人間。我將沒有一個臣民，我將不再是奴才們的君主。

我若為王，將終於不能為王，卻也真地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。“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”我將和全世界的真的人們一同三呼。

陳寅恪：清華大學 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

陳寅恪(1890-1969)，江西修水人，早年留學日本及歐美，先後就讀於柏林大學、蘇黎世大學、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和美國哈佛大學，1925年受聘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，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、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、第一組主任及故宮博物院理事等，其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；1937年“蘆溝橋事變”後挈全家離北平南行，先後任教於西南聯大、香港大學、廣西大學和燕京大學；1939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通訊院士；1942年後為教育部聘任教授；1946年回清華大學任教；1948年南遷廣州任嶺南大學教授；1952年後為中山大學教授；1955年後並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。

海寧王先生自沈後二年，清華研究院同人咸懷思不能自己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，尤思有以永其念。僉曰，宜銘之貞珉，以昭示於無竟。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，數辭不獲已，謹舉先生之志事，以普告天下後世。其詞曰：士之讀書治學，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揚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寧死耳。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，夫豈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興亡。嗚呼！樹茲石於講舍，繫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節，訴真宰之茫茫。來世不可知者也。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時而不章。先生之學說，或有時而可商。惟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歷千萬祀，與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(原載清華大學消夏週刊1929年第壹期)